

# 閻爾梅入京考論

白一瑾

**提 要：**本文對清初遺民詩人閻爾梅在京城的活动及其心態進行考證和分析。閻爾梅入清後曾四入京城，特別是後三次入京，代表了他晚年得脫獄事後，逐漸在京城文化圈中出入往來的經歷。他與清初京城文化圈的若即若離，以“布衣”、“狂士”自居的種種狂傲倔強情態，特別是與對他有救命之恩的清廷大僚龔鼎孳之間真摯而有分寸的交往，更頗可窺之清初之遺民心態，以及遺民與“主流”仕清者交往過程中的複雜微妙情形。

**關鍵詞：**閻爾梅 京城 活動 心態

閻爾梅（1603-1679），字用卿，號古古，又號白豎山人，徐州沛縣人。早年入京并加入復社，明崇禎三年舉於京兆。甲申國變以後曾入史可法幕，後返回沛縣故里，舉兵抗清。事敗後，流亡四方。順治四年，山東榆園軍起義，閻爾梅也投身其間，改裝僧服，號蹈東和尚，周游各地，聯絡抗清武裝。順治九年被捕，下濟南獄，數年後逃歸。順治十二年再遭通緝，妻妾皆畏禍自盡，遭株連者達數十家。閻爾梅不得不再度亡命四方，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直到康熙四年，閻氏父子入京，求助於時任刑部尚書的龔鼎孳，在龔氏援助下獲得寬免。此後，閻爾梅仍過着漂泊生活，數次往來於京城，直到晚年方回歸故里以終。

## 一 閻爾梅之四度入京

閻爾梅入清以後，可考者有四次入京：第一次

在順治八年九月，寓於真空寺。入京不久，即值九月十二日閻氏生日，龔鼎孳遂以書帖贈之，為閻祝壽。魯一同《白豎山人年譜·寅賓錄》收有當時龔鼎孳的書信：“天涯聚首，喜逢岳降之辰，正擬一觴為壽。”可見閻爾梅本次入京，應在其生日前夕不久。而其離開京城的時間，魯譜係於順治九年四月。而《贈王涓來太史》小序云“壬辰春客燕”<sup>1</sup>，可知閻爾梅至少在順治九年春仍在京城。

鼎革後首度入京的閻爾梅，親眼目睹故國京城為滿清異族所占據的種種情狀，心境極為悲憤。所以，他在此期間所作的詩文作品，對清廷頗有譏刺乃至痛罵，如“爰書憑筆帖，朝政掌閹氏。……顧命助臣廢，當權媚子私。九卿全結舌，三院僅承頤。晉級旌貪吏，驕兵擧遠陲”<sup>2</sup>嘲諷清廷政務之混亂；“草穀圈三輔，膏腴占八旗”<sup>3</sup>，“吸殘烟酒重吹袋，圈盡膏田亂結繩”<sup>4</sup>指斥清人圈地害民，皆是鋒芒畢露的筆墨。

1 《白豎山人詩集》卷六下。

2 《閻古古全集》卷五《燕市吟》。

3 《閻古古全集》卷五《燕市吟》。

4 《閻古古全集》卷四《京師雜咏》。

值得注意的是，順治八年入京時的閻爾梅，極有可能作為抗清武裝的成員背負秘密使命。閻爾梅本人對此并不諱言：“幾多亡國士，私送死心人。琨遯雙圖晉，荆高再擊秦。”<sup>5</sup>張相文《白耄山人年譜》因而認為，閻爾梅此次入京是為了刺探清廷情報：“山人此次入都，殆欲以覘清廷動靜，非徒以免禍而來。”<sup>6</sup>這個推測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閻爾梅此次入京，行為極謹慎，一直寓於真空寺中，對外往來交際極少，可考者只有順治八年冬，龔鼎孳曾攜酒至真空寺，與閻爾梅共飲，并邀請談胤謙、韓詩、趙而忭同席。其中除龔鼎孳外，皆係沒有官職的寒士，談胤謙更是一位遺民。《戊申禊日詩》其二下自注：“辛卯冬公會攜酒酌余於此（按：指真空寺），時偕談長益、韓聖秋、趙友沂。”<sup>7</sup>以及順治八年除夕，談胤謙留宿於真空寺：“辛卯除夕，與談長益共卧京師真空寺。”<sup>8</sup>正如張相文所指出的，此次閻爾梅在京往來者“率皆羈客游士，顯官除龔孝升外殆無一人”<sup>9</sup>。

閻爾梅入清後可考的第二次入京，即康熙四年龔鼎孳為其寬免刑獄之事。此次閻氏於康熙四年九月入京，次年春離開京城。

此前，閻爾梅在經歷了多年漂泊生活以後，於康熙元年回鄉，但因鄉人出首，復為朝廷所緝。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閻爾梅本人一開始其實并未出面向龔鼎孳求救。入京與龔鼎孳會面的是他的次子閻哭，而他自己則秘密入京，除龔鼎孳本人外，在京友人極少知悉。閻氏本人《讀龔孝升九日見懷詩有感》序言對此記載頗詳：“（閻哭）入都，聞孝升晉大司寇，哭兒云：‘吾家大禍，非此公不解。’且刑部正其職掌，即投刺往謁。公駭然。次日招飲黑窩廠，限重陽登高四韻。公有‘舊交回首盡，淒

咽到歡場’<sup>10</sup>之句，聲淚俱下，因指哭兒語坐客云：‘此閻古古先生次郎也。’適有紀伯紫、白仲調、崔免床、王衡之，皆予素交，聞之盡為駭然。蓋爾時尚未敢明言予之入都也。感而志之。”<sup>11</sup>足見閻氏父子入京實為康熙四年九月。

閻哭入京後，龔鼎孳與他的友人們便開始為如何寬免閻爾梅而設法。龔鼎孳本人雖然係貳臣，但為人頗熱心而重友情，閻圻《文節公白耄山人家傳》：“刑部龔尚書，山人故友也，輒力為解，自矢曰：‘某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豪賢哉！夫以忠義再罹難，吾不能忍矣。’乙巳十二月十一日特書題釋。”其間，客於龔鼎孳幕下的江南遺民紀映鍾、河南遺民崔干城，以及另一江南名士白夢籟，也在其中出了相當大的力量，為其出謀劃策，起草辯章，假報年齡。孫運錦《白耄山人別傳》：“適紀伯紫白仲調崔免床皆在龔處，因時有詣獄放還之例，為作辯章，增其年十歲，使小僮上之刑部，龔司寇據以老病入告，得諭旨放還。”<sup>12</sup>魯一同《白耄山人詩選本·七言律》亦有《紀伯紫白仲調為予草辨章小僮貞寧持詣刑部上之僮十四歲》。

閻哭入京後，并非求告龔鼎孳一人，他還曾往謁另一高官，時任內秘書院大學士的魏裔介，而魏也曾在其間出力。按《泗山家乘·秩東府君傳》記載：“以時有詣獄放還例，因代草狀，使小僮詣刑部上之。龔即據狀為疏，疏上，府君復謁柏鄉魏相國，遂得平反。”<sup>13</sup>

閻爾梅獲赦事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需要厘清：對於閻哭入京求助於龔鼎孳，閻爾梅本人的態度究竟如何？縱觀事件前後，從閻哭九月入京開始，一直是閻哭在京城奔走求救，而閻爾梅本人卻在京城深居簡出，并在十一月前往天壽山哭吊崇

5 《閻古古全集》卷三《韓聖秋談長益丁野鶴公酌餘於真空寺作此別之》。

6 張相文《白耄山人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68 冊，第 32 頁。

7 《白耄山人詩集》卷六上。

8 《閻古古全集》卷五《除夕與談長益同宿雨若署中分韻》。

9 張相文《白耄山人年譜》，第 32 頁。

10 龔詩係《九日招崔免床吳岱觀姜綺季朱鶴門王望如紀槩子白仲調項器宗閻秩東紀法乳姜孝阿沈雲寶王公遠黑窩廠野集用重陽登高四韻》，載《定山堂詩集》卷十四，《龔鼎孳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98 頁。

11 《閻古古全集》卷四。

12 魯一同《白耄山人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67 冊，第 746 頁。

13 張相文《白耄山人年譜》，第 77 頁。

禎陵寢。孫運錦《白登山人別傳》：“乙巳復出亡，自趙魏轉入昌平，哭莊烈於天壽山陵。是時山人次子哭亦入京投龔司寇鼎孳家。”<sup>14</sup> 閻哭從昌平將他迎回京城後，他方赴刑部獄自首，其後遂有龔鼎孳援引詣獄放還之例，增其年齡，以獲取寬免。魯譜：“乙巳十一月，山人方破帽蹇驢，哭莊烈皇帝於山陵，彷徨窮野。其子迎之，乃入舊京。”<sup>15</sup> 而且，閻爾梅在昌平得悉次子入京奔走權門求救的行爲，相當不滿，斥責其子“汝輩自爲謀，可無累矣；得毋累我乎！”閻哭一再保證“終不失吾父志”<sup>16</sup>，閻爾梅方隨子入京。因此，有些史料記載甚至認爲，閻爾梅并不知道次子入京求救一事：“遂得平反，而文節初不知也。”<sup>17</sup>

筆者認爲，雖然閻哭入京求救確實可能是他基於家族利害的個人選擇，但必定是事先得到閻爾梅許可的，而此事也極能顯示出閻爾梅身爲遺民，希圖同時保有遺民名節和家族安全，因而進退兩難、如履薄冰的糾結心態，這在他的《讀龔孝升九日見懷詩有感》中表達極爲真切：

僧窗紙碎朔風侵，夜苦更長晝苦陰。忍辱曷堪遲歲月，逃禪猶恐壘山林。同鄉連坐人何罪，烈婦無言我愧心。聞道尚書仍念舊，歡場嗚咽有微吟。<sup>18</sup>

閻爾梅的表述是極爲真摯的內心剖白。他面臨的處境之危險，不僅關乎自身生死，還有家族乃至同鄉好友的株連，他當然希望獲得朝中友人的援手而得脫獄事；但是，他自己多年來流亡四方仍不改志節的艱險歲月，和當年爲他殉難的剛烈妻妾，都不允許他晚節不保。以他的堅剛志節與倨傲性格，他絕不願爲自己和家族活命而卑躬屈膝向那些已成新朝權貴的朋友們哀求，更不願爲乞活而做出有

損名節的行爲。此種微妙心態，正可於此詩中洞見。

閻爾梅在獄事得解後的康熙五年春，啓程離京時，有這樣一段表述：“中歲遭遇齟齬，終全首領，保先人墳墓，亂世不失足，爲疾風勁草，此布衣之雄，於某足矣。”<sup>19</sup> 這正是他在求脫獄事期間的真實心態和訴求。他既希望能“終全首領，保先人墳墓”，也嚴格要求自己“亂世不失足”，保全名節。所以他默許次子入京，以晚輩身份周旋於權貴友人間，這樣便可不失他自己作爲遺民的體面；而這也正是在次子請他入京時追問“得毋累我乎”，次子一再保證“終不失吾父志”的原因：閻哭的保證，恰恰是閻爾梅所希望的“終全首領，保先人墳墓”與“亂世不失足”可以兼得，因而閻爾梅才會欣然入京。

而且，閻爾梅實際上早已做好了求救不成而爲清廷所捕拿、以死殉國的準備。這很可能正是他在次子奔走京師期間，自己卻往謁明陵的真正動機。他在謁陵時有詩云：“遁迹江湖二十春，潛來故國察風塵。煤山改作招魂路，柴市慚無灑血人。”<sup>20</sup> 出語頗爲斬截激烈。所以，他謁陵的目的極有可能是：如果次子求救不成，他在謁陵哭吊舊君後從容赴死，也是求仁得仁，了無遺憾。閻爾梅這種以舊朝遺老身份掙扎於“安全”與“名節”之間，雖以名節爲重，卻又希望能保全自己和家族的心理活動，頗可見明清之際遺民士人複雜處境與心態之一斑。

閻爾梅在回京以後，首先自然是登門向恩人龔鼎孳道謝。時龔鼎孳作有《老友閻古古重逢都下感賦》，其一：“十載逢人問死生，相看此地喜還驚。破家仍可歸張儉，無禮眞當責晏嬰。過眼山川來倚杖，吞聲賓客縱班荆。姓名已變詩篇在，尙恐人傳變後名。”其二：“城南蕭寺憶連床，佛火村鷄五夜霜。願我浮踪惟涕泪，當時沙道久蒼涼。壯夫失路非無策，老伴逢村各有鄉。安得更呼韓輩，短裘濁酒話行藏。”下自注云：“爲聖秋友沂。”<sup>21</sup> 龔

14 魯一同《白登山人年譜》，第 746 頁。

15 魯一同《白登山人年譜》，第 600 頁。

16 《泗山家乘·秩東府君傳》，張譜第 77 頁。

17 《泗山家乘·秩東府君傳》，第 77 頁。

18 《閻古古全集》卷四。

19 閻圻《白登山人家傳》，魯譜第 734 頁。

20 《閻古古全集》卷四《謁先帝陵哭之》。

21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第 1088 頁。

詩中提到顧橫波“追憶善持君每佐子急友朋之難，今不可復見矣”，顧橫波歿於康熙三年，可知此詩必作於康熙四年。“城南蕭寺憶連床”句，即閻爾梅順治八年入京，寓於真空寺，龔鼎孳同韓詩、趙而忭前往與之唱和的往事。閻爾梅亦有詩相贈，魯一同《白奩山人詩選本·七言律》有《龔司寇爲予題疏得允喜極以詩報予依韻答之》。

由康熙四年十一月入京，至次年春出京，閻爾梅這數月間在京的交際活動，可考者還有：

康熙五年元旦，與龔鼎孳、紀映鍾、白夢鼐、次子閻昉夜集宴飲。閻爾梅作有《丙午元旦孝升招飲與伯紫仲調兒同賦》<sup>22</sup>，龔鼎孳則作有《同古伯紫諸君夜集限韻》，以其一“他鄉椒酒動芳春，紅燭同驚白發新”句，其三“分謗至今全主客，留身真喜得江湖”<sup>23</sup>句，皆可知係作於閻氏得脫獄事後不久的康熙五年元旦。

康熙五年元宵，與龔鼎孳、紀映鍾、白夢鼐以錢謙益燈屏詞韻唱和。閻爾梅有《元宵與龔孝升紀伯紫白仲調同用錢牧齋燈屏舊韻》<sup>24</sup>，龔鼎孳則有《燈屏詞次錢牧齋先生韻同古伯紫仲調》<sup>25</sup>。

康熙五年三月四日，與龔鼎孳、紀映鍾、崔干城、白夢鼐游慈仁寺看海棠花，龔鼎孳作有《春夜集慈仁海棠花下同古伯紫限韻》<sup>26</sup>、《上巳後一日招同古伯紫仲調集慈仁寺海棠花下是日晨雪》<sup>27</sup>。

康熙五年清明，與龔鼎孳、紀映鍾、崔干城、白夢鼐登妙光閣，追悼顧橫波。龔鼎孳有《清明同古伯紫仲調兔床諸子登妙光閣感悼二首》<sup>28</sup>。後來閻爾梅在《戊申禊日詩》詩中還提及此事：“忽憶前年寒食候，九蓮樓上禮長春。”<sup>29</sup>

康熙五年春，閻爾梅出都還沛，啓程前夕，龔

鼎孳曾有禮物和路費饋贈。魯一同《白奩山人年譜·寅賓錄》《又柬》：“聞歸期已迫，深爲悵然。恐刻下需治裝，謹奉薄俸百金，附以縞紵爲春衣之用，極慚涼薄，恃知己能亮之行迹外耳。兩公郎各貢薄意，并望叱存。”<sup>30</sup>

閻爾梅出京時，在慈仁寺又有一聚會，參與者除龔鼎孳、紀映鍾等人之外，尚有數位在京友人：“其友六七人者會慈仁寺，共置酒觴山人。龔偕衆客亦至。”<sup>31</sup>紀映鍾作有《送古先生還沛上》。此次聚會魏裔介是否參與，尙不可考，然閻爾梅并有贈謝魏裔介的詩作《出都謝魏相國龔尙書兼示伯紫仲調》：“蕭然不挂一絲塵，汨灑東風謝主人。君相從來能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sup>32</sup>

細考康熙四年至五年間，閻爾梅入京以後的交際行爲，就可以看到，他的交際活動雖多，但交際對象并不廣泛，且絕無進入權貴文士圈子詩酒應酬的行爲。與他時常往來唱和者除龔鼎孳之外，僅有身在龔氏門下的紀映鍾、崔干城、白夢鼐等寥寥幾家。其中，崔干城（兔床）是曾與閻爾梅共起反清義兵的志士：“（崔干城）遂與沛上閻古古、濮州葉潤山、徐州萬壽祺、淮安吳嵩三、吳姬望、羽流陶鎮寅諸志士深相結納山左，起義兵。”<sup>33</sup>紀映鍾雖然身在龔鼎孳幕下，也是終生義不仕清的金陵遺民領袖。白夢鼐雖然後來於康熙九年登第，并非遺民，卻是與金陵遺民詩人餘懷、杜濬并稱“魚肚白”的江南名詩人，且當時也并未仕清。這種交往圈子的精心選擇，足見閻爾梅雖然身入京城，卻立身嚴謹、相當愛惜羽毛。而深知友人秉性的龔鼎孳，也對此予以盡量尊重和成全。在《與閻古古》中，龔鼎孳邀閻爾梅父子過訪，即特意強調在座者除崔

22 《白奩山人詩集》卷六上。

23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第1090頁。

24 《白奩山人詩集》卷八。

25 《定山堂詩集》卷四十一，第1356頁。

26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第1104頁。

27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第1105頁。

28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第1104頁。

29 《白奩山人詩集》卷六上。

30 《定山堂文集補遺》卷下，第2173頁。

31 閻圻《白奩山人家傳》，魯譜第733-734頁。

32 《白奩山人詩集》卷六上。

33 付毓祥《明遺民崔兔床先生碑記》。

干城等數人以外，別無外人：“明日望攜公郎過我，作竟日夕談。座中自免床一二君外，無別客也。”<sup>34</sup>

而閻爾梅強硬倨傲的遺民立場，更未隨獄事解脫而有絲毫改變。他在京期間與友人唱和的詩作中，即頗有不少鋒芒畢露的作品。如《都門贈李條侯》：“帽剪金貂帶縮銀，青樓選伎酌虞賓。月明霜湛紅燈綉，酸殺悲歌擊築人。”<sup>35</sup>《丙午元宵與孝升伯紫仲調哭兒同用錢牧齋燈屏舊韻》：“遼東人喜邊關調，不數江南子夜歌。”<sup>36</sup>紀映鍾《送古先生還滬上》詩云：“燈前慷慨酬知己，短嘆長吟總一哀。”<sup>37</sup>亦可見他入京後，豪氣依然不減，絕無深自斂抑以圖自全的卑下情態。在他出京時衆人爲之餞行的慈仁寺之會中，有新貴勸說他出仕：“客有官太史者，顧謂山人曰：先生不仕。先生仕，願以明史任先生。”閻爾梅當場正色峻拒，不但引用靖難之役時拒燕兵於金川門外，其後又拒仕永樂朝的龔鼎孳爲例，稱“我仕，於義則無害，如有愧龔安節。”<sup>38</sup>而且還毫無顧忌地直接提到自己“初與諸同志者起”的反清往事，毫不考慮自己是剛剛得脫重案的前“政治犯”，更不考慮當時有清廷新貴在座，以至於紀映鍾都擔心他再因言辭賈禍，趕緊在席間大呼“先生是也！止勿復言。”閻爾梅雖然極重感情，也感激友人的慷慨相助，但他即使是活躍於清廷治下的京城，與清廷新貴文人把酒同歡，在精神上也仍然是剛烈的志士，堅貞的遺民。

自康熙四年得脫獄事以後，閻爾梅多次來往於京城。他在京城的數次進出，分別在康熙四年冬至康熙五年春，康熙六年冬至康熙七年春，康熙九年冬至康熙十年春夏之交，基本上保持了二至三年入京一次，到京後居住數月的頻率。且每次入京，都與他的摯友兼救命恩人龔鼎孳，以及龔氏門客，有較密切的交往。由於閻爾梅在京城往來太過頻繁，

甚至時人訛傳他已出仕：“丙辰春，有訛傳古古已出仕者。……時蠶庵諸公爲之驚愕，削其遺民之籍。古古實未出仕，然可以見當時清議之嚴。”<sup>39</sup>丙辰爲康熙十五年。可見閻爾梅雖然自始至終并未出仕，但他與京城詩壇特別是以龔鼎孳爲代表的京城顯貴的密切關係，已經頗令清初清議極嚴的輿論環境有所不滿。

閻爾梅入清後可考的第三次入京，是在康熙六年冬。在這一年的秋天，他曾出關游上谷，龔鼎孳有書寄之，并資助路費。魯一同《白豎山人年譜·寅賓錄》載有龔鼎孳的書信：“奉上少許，暫助出關僕馬之需。希照入午餘，望過我一談，雖小別亦不宜草草也。”閻爾梅可能正是因爲龔鼎孳這通書信，所以由上谷歸來後即再次入京，探訪老友，寓於真空寺，一直逗留到次年三月。在此期間，閻爾梅的交際活動，可考者如下：

康熙六年冬，閻爾梅於雪後同紀映鍾、錢肅潤、朱彝尊等諸多文士集於龔鼎孳寓所，以杜韻賦詩。龔鼎孳有《雪後古古槩日子壽方虎荆名遥集康侯錫鬯湘草武曾緯雲竹濤青藜仲調穀梁武廬同集小齋古老限杜韻即席四首是日稚兒初就塾》<sup>40</sup>四首。

康熙七年正月初七日，龔鼎孳招閻爾梅、紀映鍾、周容、陸嘉淑等分韻賦詩。龔鼎孳有《人日同古古諸君作》<sup>41</sup>，閻爾梅則有《戊申人日孝升招飲與周鄭山陸冰修朱錫鬯紀伯紫分韻》<sup>42</sup>。

康熙七年二月，閻爾梅再至昌平謁十三陵，適逢龔鼎孳訪閻爾梅於真空寺，不遇。龔鼎孳遂作《憶古老昌平之游》<sup>43</sup>。

康熙七年戊申三月三日，閻爾梅啓程離京，龔鼎孳招集衆友於真空寺爲其餞行，“同席

34 《定山堂文集補遺》卷下，第2173頁。

35 《閻古古全集》卷三。

36 《閻古古全集》卷三。

37 張相文《白豎山人年譜》附錄，第55頁。

38 魯一同《白豎山人年譜》，第734頁。

39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6-1457頁。

40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二，第1141頁。

41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第1092頁。

42 《白豎山人詩集》卷六上。

43 《定山堂詩集》卷四十一，第1360頁。

有金陵紀伯紫、武林吳興公、長洲文與也、嘉禾吳佩遠、龔伯通、龔禹會、龔雪舫暨二兒嬰。”<sup>44</sup>龔鼎孳作《攜樽真空寺送古古》<sup>45</sup>二首。閻爾梅遂作《戊申禊日詩》十四首和之。

與數年前避禍入京時相比，這次入京，閻爾梅顯然在心態上更加從容，在京城的文化交往也更為積極：“山人此次入都，與諸名流唱和頗多。”<sup>46</sup>回顧康熙四年入京時，閻爾梅僅僅與龔鼎孳及其門下有限的幾位遺民清客紀映鍾、崔干城、白仲調有所往來；而康熙六年的這次入京，閻爾梅的交往對象就廣泛得多。康熙六年賞雪之會中，紀映鍾（槩子）、錢肅潤（礎日）、曾燦（青藜）都是入清不仕的遺民，朱彝尊雖然後來應博學鴻儒科，晚節不保，但此時尚有遺民身份；白夢鼎（仲調）後為康熙九年進士，徐倬（方虎）為康熙十二年進士，李良年（武曾）後來應博學鴻儒科，皆是并不排斥清廷的新貴文士；還有蔡湘（竹濤）這類尚在太學的晚輩後學文人。康熙七年人日之會中，周容（鄮山）、朱彝尊、紀映鍾皆是遺民，而陸嘉淑雖也以不仕相標榜，實則更類似於山人游士之流。康熙七年的真空寺餞行之會中，吳祖錫（佩遠）是遺民，吳振宗（興公）、文點（與也）皆係游士，龔士正（伯通）則係龔鼎孳族人。可以看到，此時間爾梅在京的交往對象之廣泛，已遠非“遺民”或“龔氏門客”所能涵蓋。

而閻爾梅此時之心態，也較數年前更為複雜而五味俱全。三月三日真空寺餞行之會中，龔鼎孳作《攜樽真空寺送古古》二首相贈，閻爾梅遂步韻和之，《戊申禊日詩》自序記載極詳：“余久客燕京，戊申春將南去，大司馬龔公以三月三日餞我於城西之真空寺，偶吟杜詩‘三月三日天氣新’一句，因拈天字、新字為韻，即席書七言律二章，索余和之。浸淫至每韻七章，共得十四章。中間頗追往事，雜以近聞，或頌或規，淋灑悲感，不自知其文生於情也。”<sup>47</sup>龔的原詩為：“小住為佳碧草天，醉鄉相

勸故鄉先。別當垂老翻無泪，花近殘春易着烟。寶馬香車他自得，清樽疏雨事堪憐。同游賓從多黃土，重過珠林憶往年。”“輕陰天氣亦能新，過雨全銷步履塵。中酒恰經寒食候，落花常似未歸人。蓬蒿此去誰開徑，萍梗吾生應有鄰。送客年年還作客，白頭真自負青春。”<sup>48</sup>雖然并非全無真情實感的應酬文字，但筆下只及二人友情，而絲毫不涉及其他。

閻氏的和作卻完全不同，他在自序中自稱“中間頗追往事，雜以近聞，或頌或規，淋灑悲感，不自知其文生於情也。”<sup>49</sup>十四首詩中，頗能見他當下心境。他對龔鼎孳數年前的救援之恩感銘深切：“不祥繇我誰能祓？知己如君遂有鄰。”“力撥重雲復見天，爭如文學脫文先。”也表示自己將從此避世隱居，不再過問世事：“關尹佇看青犢氣，留侯期與赤松鄰。”“此後行踪無可諱，持螯持酒再生年。”

然而，閻爾梅畢竟是個志節堅剛且性格高傲的遺民，當年他甫脫大難不久，就敢於當面峻拒清廷官員的延攬，且以“初與諸同志者起”的反清往事為榮；此時在真空寺，他所表現出的依舊是不輸於當年的驕傲強硬：“姓字常為山鬼笑，須眉肯受里兒憐？”“人鬼餘生甘自放，龍蛇分路耻相憐。”即使是被清廷顯貴們如此欣賞和厚待，他仍堅持自身的遺民立場，強硬地宣稱自己和後者并非同路。

更重要的是，由於顧慮家族安全而不得不有所妥協，放棄反清活動，這種艱難的選擇，其實是令閻爾梅頗感愧悔與痛苦的。“待詔堪羞東郭子，移文取笑北山鄰。”“心悲晚景歌皆痛，士遇奇才恨亦憐。”《戊申禊日詩》組詩中的第二首，最能見其真實心境：

畚鍤平治紫陌新，雨師先為我清塵。  
漁樵各有傷心事，天地常如中酒人。  
大野蒼涼朱雁度，高山巖巖白雲鄰。  
淮南席主江南客，點綴離亭處處春。

44 《戊申禊日詩》自序，《白耆山人詩集》卷六上

45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第1117頁。

46 張相文《白耆山人年譜》，第58頁。

47 《白耆山人詩集》卷六上。

48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第1117頁。

49 《白耆山人詩集》卷六上。

雖然身處繁華帝京，閻爾梅想到的卻是險峻的崇山、蒼涼的荒野，這既是他心目中故國山河的寫照，更是他自己昔年心懷壯志奔走四方的志士人格的縮影。在真空寺酒宴充滿崇拜與友情的“處處春”的氣氛裏，他感受到的是一種衆人皆醉我獨醒的深刻的孤獨，這正是他要長嘆“天地常如中酒人”的原因。他作為一個“不哭窮途哭戰場”的志士和遺民，終究只是京城文化圈的一個異己和過客。

閻爾梅入清以後的第四次入京，在康熙九年冬。《閻古古全集》卷二《送趙國子游隴西》小序云：“余以庚戌冬復入燕京。”直到康熙十年四月，他離開京城。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入京。

需要注意的是，魯譜認為閻爾梅在康熙八年末至九年初期間，尚有一次入京，逗留到康熙九年四月。其“庚戌九年”條下云“自塞外入都，四月還沛。”<sup>50</sup>張譜也以訛傳訛，沿用了這一觀點。但實際上，魯譜的推斷很可能是錯的。閻爾梅“自塞外入都”，事在康熙九年冬，《閻古古全集》卷四有《庚戌冬復自塞外入都夜集孝升齋中限韻》。此外，《白豎山人詩集》卷六上有《孟夏朔日宗伯偕伯紫青璫召侯餞余真空寺限韻》，魯譜和張譜都認為此詩作於康熙九年四月，并藉此作為閻爾梅康熙九年春曾在京城，四月離京的證據。但實際上，此詩其實是康熙十年四月所作。其下自注云：“是日魏石生閣老亦出都門。”魏裔介以疾辭歸，事在康熙十年正月，《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三十五“康熙十年正月”條下：“大學士魏裔介以病乞假，命回籍調理。”故此詩絕不可能作於康熙九年。魯譜極有可能是將閻爾梅康熙九年冬由塞外入京，十年四月出京，誤認為康熙九年四月出京，因而形成了閻爾梅在康熙九年曾兩度入京的錯誤印象。

這一次，閻爾梅在京的交往圈子仍以龔鼎孳及其門下士人、故交好友為主，旁及京城新貴文人。由於他的特殊經歷和倨傲強硬性格，頗因此出現一些小插曲乃至不愉快事件。其中可考者有：

康熙九年冬，王士禛、王士禛兄弟召閻爾梅聚

飲，閻爾梅使酒罵座，被王士禛用言語窘辱。此事在《居易錄》中記載甚詳：

康熙庚戌冬，沛縣閻爾梅古古在京師，先考功兄召同吳江顧萬祺庶其飲，予在座。閻老而狂，好使酒罵坐，酒間愚兄弟叩其所作，閻朗誦數篇，顧以前輩事閻，執禮甚恭。至是起贊曰：“先生詩不減杜少陵矣。”閻勃然怒，直視顧曰：“小子何知？何物杜甫，輒以況我耶？”顧面色如土，蹙蹙而已。予殊惡閻之僭誕，思抵巇以折其氣。有頃，閻又自舉其云中與曹侍郎秋岳倡和近體詩“當日戰場成過禮，至今兵氣滿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云云，予曰：“先生此詩，可追空同‘黃河水繞漢宮牆’之作。”閻大悅曰：“知言哉！向者芝麓（謂合肥龔端毅）云：有詩當示西樵阮亭兄弟，信然。”予徐笑曰：“知言某不敢當，然有一言相質。先生謂李獻吉顧出杜子美上乎？”閻愕然曰：“何謂也？”予曰：“適顧生以子美擬先生，某私以為太過。而先生怒斥之。某以獻吉擬先生，而先生乃大喜，然則獻吉不遠過子美乎？此某所未喻也。”閻赧甚不能答，但連呼曰：“不必言，且可飲酒耳。”未久遁去。明日西樵謂：“予弟昨困此老已甚。予觀閻作但工七言八句，然率有句無篇，又皆客氣，不合古人風調。至七言古詩，并音節亦不解，直如警詞信口演說。世人但為其氣岸所奪耳，自法眼觀之，不免野狐外道。”<sup>51</sup>

張譜闡釋王士禛窘辱閻爾梅的原因，認為一方面是“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另一方面也與政治立場有關，“（士禛兄弟）連翩出仕，絕無所謂故國之思，種族之感，……其以山人為狂誕也固宜。”<sup>52</sup>這類誅心之論未免引申太過。王士禛所交往的遺民士人數量并不少，且對京城另一遺民詩人團體“河朔詩派”評價頗高，與“河朔詩派”代表人物申涵光、趙湛等也有極好的交情。他即使對亡明并無閻爾梅那樣深刻的感情，卻也不至於毫無心肝到折辱遺民以取悅清廷的地步。

筆者以為，王士禛反感閻爾梅的真正原因有二，其一是源於個人性格和修養，其二則是文學理

50 魯一同《白豎山人年譜》，第 605 頁。

51 《居易錄》卷十三，《王士禛全集》，齊魯書社 2007 年版，第 3922-3923 頁。

52 張相文《白豎山人年譜》，第 63 頁。

念不合。王士禛是一個性格溫雅而中庸、講求風度的世家子弟，且正在努力營造自己作為新一代文壇盟主的平易可親形象，對閻爾梅這種狂傲不羈、自高身份、使酒罵座的晚明老名士習氣，自然十分不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王士禛與閻爾梅的文學理念與創作取向，有本質上的區別：

閻爾梅是極典型的清初七子復古派傳人，《晚晴移詩話》評其詩云“詩頗有新意，然淵源仍自七子出。”<sup>53</sup>而且還因為身歷鼎革、奔走復國、心境淒愴悲憤，因而呈現出不加修飾的慷慨揚厲之氣，其變風變雅色彩極為鮮明。沈德潛《明詩別裁集》言閻爾梅“詩有奇氣，每近粗豪”<sup>54</sup>，評價相當準確。

而王士禛的審美取向卻與閻爾梅在諸多方面都大相徑庭。首先，他雖然出身山左，卻絕非七子一路。他更崇尚王孟一路清澹詩風：“阮亭又云：餘於唐，獨愛王孟之詩，嘗手奇字齋所箋釋者，三編絕而不厭。”<sup>55</sup>卻對七子的高格響調敬而遠之。汪琬《說鈴》：“王進士言：若遇仲默、昌谷，必自把臂入林；若遇獻吉，便當退三舍避之。予時在座，遽謂曰：都不道及汝鄉於鱗耶？王默然。”更重要的是，他作為後來被康熙帝欽點入翰林院的“御用”文壇盟主，其風格必然是溫柔敦厚、歌咏太平的正風正雅之音：“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澹，被服典茂。其為詩歌也，溫而能麗，嫻雅而多則。覽其義者衝融懿美，如在成周極盛之時焉。……阮亭先生既振興詩教於上，而變風變雅之音漸以不作。”<sup>56</sup>有這種“正統”氣味濃厚，又殊為講究“典遠諧則”的文學理念，也難怪王士禛要批評閻爾梅是“不合古人風調”、“直如瞽詞信口演說”的“野狐外道”了。

閻爾梅在事件中的表現，也頗耐人尋味。他本是性格倨傲強硬的遺民志士，自尊心極強，此次居然被文壇晚輩當面折辱，無言以對，卻也并未當面

翻臉。因而頗有研究者認為，此時間爾梅年事已高、鋒芒收斂，因而不願得罪王士禛這位已經在京城詩壇隱然具有新一代“職志”地位的仕宦名流。此說恐也不甚準確。筆者認為，王士禛能面折閻爾梅而令其啞口無言的原因是：七子復古派以“詩必盛唐”自我標榜，但實際上他們所崇尚的“盛唐”主要是指杜甫：“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迤，獨於沉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為昆侖墟。”<sup>57</sup>閻爾梅素以七子復古派傳人自居，卻表現出對七子之“祖師”杜甫的不敬，這確實是酒後失言，也難怪會被王士禛抓住把柄。

康熙十年立春後二日，周在浚攜具過飲龔鼎孳寓所，龔鼎孳邀閻爾梅、紀映鍾等聚飲，并有《嘉平立春後二日雪客攜具過小齋招同古古條侯平子湘草谷梁槩子飲中限韻》<sup>58</sup>二首。

康熙十年正月二十七日，時間爾梅已有歸意，龔鼎孳招其與王士祿、王士禛兄弟，以及紀映鍾、崔干城、劉體仁等在其寓所西堂聚會。這次西堂之會的規模相當大，除了閻爾梅的老熟人紀映鍾、崔干城這兩位龔氏“遺民門客”之外，還包括雖然依附於龔鼎孳門下，但已經在京城嶄露頭角、聲譽鵲起的文壇新秀王士禛、王士祿兄弟和劉體仁。由於王士祿在康熙九年九月方回京補官，這一聚會必在康熙十年正月。時龔鼎孳有《春夜古古兔床子存伯紫公·西樵阮亭同集西堂志別次韻》<sup>59</sup>、《古古諸子集西堂時方乞歸》<sup>60</sup>。後者自注云：“春王二十七夜作。”其三云：“去日苦多歡不足，半生虎穴復蛟宮。淒涼躍馬羸糧事，收拾殘山剩水中。豈有巢由無隱地，可憐沈范總衰翁。蒼生捉鼻書空裏，慚愧當時系望同。”頗能言盡閻爾梅一生事業。閻爾梅則有《春夜集孝升齋中偕魏子存劉公·程蕉鹿王西樵王貽上崔兔床伯紫仲調限韻》：“冰栗金柑滌玉觥，山人春仲出春明。螳螂誤入琴工指，鸚

53 《晚晴移詩話》卷十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 頁。

54 《明詩別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5 頁。

55 顧宸《漁洋集外詩》序，《王士禛全集》，第 518 頁。

56 《漁洋詩集》陳維崧序，第 139-140 頁。

57 《漁洋文集》卷十四《七言詩凡例》，第 1759-1762 頁。

58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二，第 1146 頁。

59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第 1094 頁。

60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第 1093 頁。



鵝虛傳鼓吏名。飲餞何妨呼竟夜，還家不復憚長徵。吳歛絲竹齊謳板，近曉驪歌一再賡。”<sup>61</sup> 頷聯頗為膾炙人口。“螳螂”以蔡邕典故，喻自己的死裏逃生；“鸚鵡”句以禰衡典故自喻，卻仍帶倨傲不平之氣。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記載提到，西堂之會中，王士禛對閻爾梅又有譏諷之語。鄧之誠《骨董瑣記》卷八引戴楓仲《游崇善寺記》：“閻古古，沛豐邑庚午舉於鄉，能詩，有名崇禎間。甲申後不赴公車，人益敬之。王公賚上為江北司理，慕古古名，屢訪之，不肯見。越數年，賚上入燕，及於龔司馬席上見之，即舉手向古古曰：‘弟待罪貴鄉時，望先生如景星慶雲，一見不可得。不意長安風塵中，先生亦到此。’古古默然。”不過，這條記載，不實之處很多：其一，王士禛所任為揚州推官，與閻爾梅故里徐州風馬牛不相幹，何來“待罪貴鄉”之說？其二，王士禛在司李揚州期間，閻爾梅是與他見過面的，并非“屢訪之，不肯見。”閻氏有“懷君猶記山東夜，誦我揚州險韻詩。”注云“王賚上作揚州司理，作此示之。”<sup>62</sup> 即可為證。據魯譜，閻爾梅曾於康熙元年七月至揚州，他與王士禛見面定交，必在此時。此外，以王士禛的身份與性格特點來看，他當時還是龔鼎孳門下之士，身為晚輩後進，性格又比較謹慎世故，更不大可能在龔鼎孳主持的宴會上，當面窘辱龔鼎孳的老友。這條記載的真實性，恐還需存疑。

康熙十年四月初一，閻爾梅即將離京，龔鼎孳和紀映鍾、曾槃等在真空寺為其餞行。《白奩山人詩集》卷六上有《孟夏朔日宗伯偕伯紫青璿昭侯餞余真空寺限韻》，其下自注云：“是日魏石生閣老亦出都門。”前文已有分析，魏裔介以疾辭歸，事在康熙十年正月；則真空寺送別，必在康熙十年四月。

## 二 閻龔交往之心態

在厘清了閻爾梅與京城的淵源之後，有一問題頗值得深思：如閻爾梅這樣大節堅剛不可奪的遺民

志士，何以能與龔鼎孳這位聲名狼藉的“三朝元老”長期保持友誼，甚至能不顧清初對遺民的清議之嚴苛，冒着被時人誤解為出仕和背叛的風險，一再入京與他相見往來？細究這兩位不同出身和政治立場的摯友的交往，頗能見清初遺民與貳臣這兩大士人群體各自的心態，以及交往過程中的種種複雜的心理活動和人事背景：

從龔鼎孳一方來看，身為貳臣而能與閻爾梅這位鐵石心腸、姜桂之性的遺民長期保持友誼，這與龔鼎孳的寬容謙和、世情練達，是分不開的。在與閻爾梅的交往中，龔鼎孳時時表現出對閻氏人格的敬仰、對其政治立場的尊重，和相當高的人際交往技巧：

首先，雖然龔顧二人的身份與政治立場皆有天壤之別，但兩人皆係身歷鼎革滄桑巨變的士人，至少有一個情感話題在他們心中能引起同樣的共鳴：對於故國淪亡的黍離之悲。這也是龔鼎孳在與閻爾梅往來唱和時，經常涉及的內容。

以康熙五年元宵節時，龔鼎孳所作的七絕組詩《燈屏詞次錢牧齋先生韻同古古仲調》為例，其詩的題材本是常見的咏節令之作，卻引入對故國黍離、山河易代的嗟嘆：“開元法曲夢華遙，腸斷春雲度玉簫。寶馬香車今夕動，幾人回首杜鵑橋。”<sup>63</sup> 這是很能引發身為遺民的閻爾梅的心靈共鳴的。又如《古古仲調飲中同和蜀道諸詩韻》其五：“一歌出塞曲，風笛滿伊涼。落日長陵汨，孤雲五岳糧。沛應魂魄戀，酒為別離香。歸去餘田井，巢由幸遇唐。”注云“古老秦中詩有‘長陵帝子故鄉人’之句”<sup>64</sup>。頷聯特意引用了閻爾梅本人吟咏故國情懷的詩句，并加以闡發。正是在這種彼此共有的黍離之悲的抒發中，龔鼎孳巧妙地拉近了雙方的心理距離。

其二，龔鼎孳對閻爾梅堅剛不屈的遺民氣節，時時給予高度評價。閻爾梅雖然剛直無畏，但倨傲好名，極以自己的遺民氣節為榮，正如他本人所說“亂世不失足，為疾風勁草，此布衣之雄，於某足矣。”<sup>65</sup> 而龔鼎孳對此也不吝頌美，若《春夜次古

61 《白奩山人詩集》卷六上。

62 《白奩山人詩集》卷八《游揚州北湖有感》。

63 《定山堂詩集》卷四十一，第1358頁。

64 《定山堂詩集》卷十四，第500頁。

65 閻圻《白奩山人家傳》，魯譜第734頁。

古韻十五首》其四：“東海以一蹈，北山誰敢移？”<sup>66</sup>《喜古古重至都門》：“天涯烏鵲總南枝，飄泊根柯晚不移。”<sup>67</sup>這種既飽含真誠的贊許，又不乏人際交往技巧的頌美之辭，對閻爾梅來說，是十分入耳的。

其三，龔鼎孳在與閻爾梅交往時，把自己的立場擺得很正，從不吝於表現自己身為貳臣的愧悔心態。他在入清之後，與閻爾梅詩文往來的最早記載，是在順治三年去官回鄉時途經徐州，與閻爾梅的書信中即言“不孝孤不才失路，慚負良友。……雖覩言忍耻，不足齒之尸餘。”<sup>68</sup>即使是在開脫閻爾梅獄事，於閻爾梅有救命之恩以後，龔鼎孳仍然時常在唱和作品中表現出愧悔。如他在《同古古伯紫諸君夜集限韻》中，即以江總自喻：“江總還家愧黑頭”<sup>69</sup>，以表現自己失身二姓的羞愧。這種較低的姿態和真誠的愧悔之情，也是以氣節自重的閻爾梅較能接受這位名節喪盡的友人的原因。

其四，在更多的場合裏，龔鼎孳是盡量避開雙方政治立場的區別，僅以純粹的友人身份，與閻爾梅詩酒唱和：“歡宜今夕永，交羨古人窮。”<sup>70</sup>“海內良朋膠漆在，賞音金石恰相撞。”<sup>71</sup>在交往過程中，龔鼎孳或將自己的身份定位為人到中年因而特別重視昔日友情的老友：“客路春隨寒食去，中年心對故人長。”<sup>72</sup>或將自己定位為禮賢下士的高官，而將閻爾梅視為隱士高人：“山逢介子來高隱，酒愛平原只布衣。”<sup>73</sup>都巧妙地避開了兩人之間立場的尷尬差距。再以《春夜次古古韻十五首》為例：“遺事問開元，應銷花月魂。人隨今雨別，心老舊交門。短檠悲堪和，春星醉不昏。得歸天浩蕩，文網息掛根。”<sup>74</sup>其詩更是入情入理，以共同經歷的鼎革之

變作為拉近彼此心理的切入點，且不論彼此立場差別，而僅論“舊交”之友情。在這一場合中，既無“貳臣”，也無“遺民”，只有兩位同樣是渡盡劫波、人到中年的老友。這也正是鼎革以後那些政治立場迥異的友人之間的來往，最常見的情形。

其五，龔鼎孳是一個性格寬厚豪宕而頗富於包容性的人，所以，雖然身為清廷高官，他卻對於閻爾梅這位抗清遺民的性恪心態、政治立場和生存方式，能給予最大程度的尊重。特別是對閻爾梅的“山野之性”極為包容：“但喜雪霜人健在，不須湖海氣全除。”<sup>75</sup>

在充分尊重和包容閻爾梅遺民志節和故國情懷的前提下，龔鼎孳也對閻爾梅進行溫和的規勸：“看世漁樵穩，還家姓字多。”“歸去餘田井，巢由幸遇唐。”<sup>76</sup>“豈有巢由無隱地，可憐沈范總衰翁。”<sup>77</sup>“吹簫伏劍非無事，辟谷封留總此身。珍重鹿門遺老在，須將出世答君親。”<sup>78</sup>龔鼎孳尊重閻爾梅的遺民志願，對他半生奔走復國、九死不悔的頑強精神，更是深感欽佩；但也希望他用較為緩和的隱居不仕的方式（而非更激烈的反清）來度過餘生。這種規勸，既不以清廷高官的勢派壓人，也不以救命恩人自居，僅以多年老友的身份，勸告閻爾梅忘卻前塵往事，放棄危險的反清活動，回鄉隱居。由於隱居田園並不違背身為遺民的政治操守，且這種勸告本身就是善意而入情入理的，因而，即使是剛烈倔強的閻爾梅，對此也是不難接受的。

從閻爾梅一方來看，他身為遺民，卻時常在京城文化圈中活動，且與清廷高官往來，這種行為本身就相當微妙而容易引人誤會（他也確實因此而被懷疑操守不堅、希圖出仕，而遭到其他遺民人士的

66 《定山堂詩集》卷十五，第 506 頁。

67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第 1113 頁。

68 《定山堂文集》卷二十五，第 2047 頁。

69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第 1090 頁。

70 《定山堂詩集》卷十五《春夜次古古韻十五首》，第 506 頁。

71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和古古》，第 1119 頁。

72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花下同古古作》，第 1115 頁。

73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一《春日古古伯紫昭茲同集小齋》，第 1113 頁。

74 《定山堂詩集》卷十五《春夜次古古韻十五首》，第 506 頁。

75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春夜鶴門仲調招同古古紳黃望如集慈仁松寮》，第 1095 頁。

76 《定山堂詩集》卷十四《古古仲調飲中同和蜀道諸詩韻》，第 500 頁。

77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古古諸子集西堂時方乞歸》，第 1093 頁。

78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人日同古古作》，第 1092 頁。

誤解)，但閻爾梅對此卻並不顧忌，仍然頻繁來往於京城，其中的心態變化，也頗耐人尋味：

首先，閻爾梅對龔鼎孳的仗義施以援手，是感念備至的，也在他的詩作中時時提及。例如康熙五年秋，龔鼎孳給假回鄉葬母，閻爾梅也前往與會，他在《廬郡夏秋詩為龔孝升作》中寫道：“自解山東網，漁樵路始寬。百年知己泪，一粒返魂丹。”“須作救時相，堪題通德門。朝中推故老，海內感平反。”他甚至給予了龔鼎孳“身任朝廷事，功垂父母邦。世間人有數，天下士無雙”<sup>79</sup>的盛贊。

其次，閻爾梅雖然性格剛直不屈，但他也是個相當驕傲而愛名的人。作為青年時代就廣為結交且加入復社的閻爾梅，入清後仍保留了濃厚的晚明名士習氣。查為仁《蓮坡詩話》卷上：“古古係刑部獄時，自署其門曰：闖天下無根禍，坐人間第一牢。”《留溪外傳》卷六《三逸傳》：“閻古古羈旅朔方歲餘，無有識者。常戴草笠，披青蓑，酣歌於市，市中人目為顛道士。盛暑憩息浮屠影中，箕踞笑傲。”皆足見其性格中頗有張揚倨傲的一面。所以，雖然他對清廷顯貴們的經濟饋贈毫不在意，對他們提供的仕宦機會更是棄如敝屣；但京城文化圈給予他這位“布衣”士人的高度禮遇，卻讓他頗感欣喜：“結社神京集各天，布衣常坐五侯先。”<sup>80</sup>“窮交大與尋常異，不餞三公餞布衣。”<sup>81</sup>其詩係於康熙十年四月，閻爾梅啓程離京，恰逢大學士魏裔介辭官回鄉，閻氏自注云“是日魏石生閣老亦出都門。”顯然，對於自己離京時所獲得的較魏裔介更多的關注和送別，倨傲而又好聲名的閻爾梅是十分自豪的。

閻爾梅肯出入於京城的第三個原因，也是較深層的原因，是他在歷盡滄桑浩劫之後，對於安定生活的向往。榆園軍事敗以後，閻爾梅隱姓埋名流亡四方，生活十分艱難危險，而且還連累諸多親友罹

難，他對此也多有嗟嘆：“家亡何所顧？白首任飄零。”<sup>82</sup>“自經離亂後，凡事與心違。君載妻孥累，吾逃姓字非。”<sup>83</sup>“未能逃死去，且復學逃生。多累嫌妻子，深藏苦姓名。”<sup>84</sup>足見他對逃亡生涯的厭倦。

隨着歲月流逝，這位剛烈倔強的明朝遺老，也不能不生出對於安定的鄉里家居生活的向往：“舉足罹羅網，依依此墓田。倘如首丘志，何用買山錢。”<sup>85</sup>而這種還山之夢，對於他當時的處境，又是何等的奢望。這也就足以解釋，為什麼龔鼎孳在保全其名節的前提下，巧妙地洗脫了他背負的叛案，他會如此感激：“此後行踪無可諱，持螯持酒再生年。”<sup>86</sup>對於獄事得解後的安穩的隱居生活，他也是頗有期待的。

不過，獄事的解脫，和與京城文化圈特別是其中仕清文士的頻繁往來，並不意味着閻爾梅的身為遺民的人格心態有所變化。在藉由清廷顯貴之力得脫獄事以後，他雖然未再涉足反清活動，但遺民志節和狂傲性格仍然不改。他在康熙四年以後的多次入京，除了與龔鼎孳往來時態度尚屬謙和以外，他與京城其他新貴名流的往來，都是頗為驕傲矜持的。他與魏裔介互通名刺時，名帖上竟然僅書自號“白豨山人”而不書姓名，京師異之，閻氏有“地主都忘卿相貴，山人戲答姓名非”<sup>87</sup>紀之。魏裔介時任內秘書院大學士，閻災在京奔走時，也曾得他助力。閻爾梅在這位權勢滔天的閣老面前竟也能有此晚明名士狂態，其性格之狂傲，可見一斑。

而閻爾梅在京城與清廷仕宦文士們交際唱和時，也仍然喜作驚人語。作於康熙七年的《戊申人日孝升招飲與周山陸冰修朱錫鬯紀伯紫分韻》末云“朝來聞道修明史，洪武元年紀戊申。”<sup>88</sup>此詩在京城傳播，達到“京師傳之駭然”的效果，龔鼎

79 《白豨山人詩集》卷五。

80 《白豨山人詩集》卷六上《戊申禊日詩》。

81 《白豨山人詩集》卷六上《孟夏朔日宗伯偕伯紫青藜昭侯錢余真空寺限韻》。

82 《閻古古全集》卷五《柯蘆秋以詩投我次韻答之》。

83 《閻古古全集》卷五《雁門送李天生歸陝》。

84 《閻古古全集》卷五《微山東友人》。

85 《閻古古全集》卷五《微山東友人》。

86 《白豨山人詩集》卷六上《戊申禊日詩》。

87 《白豨山人詩集》卷六上《答魏石生相國惠菊酒》。

88 《閻古古全集》卷四。

孳只好替他打圓場說“既修明史，自當從洪武戊申始。”足見京城那些與清廷新貴們詩酒唱和的日子，並沒有改變他強硬倨傲的本色。

閻爾梅在獲釋以後，一直恪守身為遺民的本分：尊崇故國，以明為正統。他多次以遺民身份拜謁明陵，如康熙七年二月，他在京城期間，即至昌平謁十三陵；在這一年秋，他出京之後，還曾南下金陵謁明孝陵。他在臨終之際的表現，更可說明問題。閻圻《家傳》記載其臨終高歌蘇子卿牧羊之曲，且自稱“夢祭於天壽之山，先皇帝命予坐，予固崇

禎間人也。”<sup>89</sup>足見他在生命最後一刻，仍然以明遺民自居，不墮志節。

對於閻爾梅和京城的關係，袁佑《閻古逸人自邯鄲入鄴書期上已過訪兼示近詩依韻賦寄》一詩，最能概括：

老去詩篇字字新，廬山晴雪踏輕塵。  
傷心偶問長安路，揮手終為太古人。<sup>90</sup>

【白一瑾 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

89 閻圻《家傳》，魯譜第 738-739 頁。

90 《霽軒詩鈔》卷一。